



汉学与儒学的传承（梁宗华）

(2005-7-13 10:14:13)

作者：梁宗华

与这种抽象性相伴随的，偏旁部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偏旁部首的分类是适应于汉字的发展而发展的。汉字的创造，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天地自然、社会人类，可以说无所不包，《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个字，所谓，“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1]，而以540部首为通领。部首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严格的，每一部首收字的密度能表现出这一事类与人类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反映出人类对某一领域事物的思想认识程度，而这种密度是变化着的，如“气”部，在《说文》中只收了两个字，到《康熙字典》则增加到17个，而《汉语大字典》仅新造字就有23个。这种变化正是偏旁部首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体现。由于其结合能力、组字能力极大提高，它可以不断地创造、接纳新字，适应任何新生事物、新的词语而造的汉字，都是能够纳入某一偏旁部首之中的。

正是因了特殊的形体结构，汉字字符本身就具有了直观性、象征性的特色。

二

同拼音文字相比，除了上述构字特点和规律外，汉字还具有许多特殊的功能。

首先，因字、词的一致性而具的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

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词法、句法及一般的词义信息蕴藏于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不依靠词汇形态表示，而藉由词序的变化予以显现。汉字与汉语相适应，表现为一字一音的单音节文字，由于形体构造的形象性、表意性特点，汉字字、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因此具有了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在拼音文字中，以字母为基本构词元素，以多音节词为表意性单位；而在汉字系统中，一个汉字字符既是汉语基本的区别性单位，同时一般又为基本的表意性单位。汉字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既不分词也不连写。汉字本身因义而构形遂确定了单字又同时是词的性质，每个汉字都直接意指某事物，一个词的词义经过字形的分析即可探得。如“蓍”字，同时也是一个词，从其从“艹”部，可以知道这是一种草名。如“礼”字，也是一个独立的词，因其从“示”部，可以探得它与祭祀的关系。汉字以义构形的造字原则，增强了单字本身的意义蕴含，便于从上下文的联系中探知语词的确切信息。

由于字、词的一致性，一字多义与一词多性相统一，汉字又可以表示多种词性。一个汉字除能表示一个具体词的意义，还能表示多个词的意义，随具体的语境在不同的组合中有不同的性质。如“操”字就有多种意义，作为词亦有多种性质，它可以记写“拿”、“掌握”、“品行”等意义的词，如“操刀”、“稳操胜券”、“节操不保”，又有动词与名词之分。

由于字、词的一致性，汉字在组词的时候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能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层层组合。可以通过单字与单字之间的组合构成新词。如“封”、“禅”二字皆是独立的词，“封”义祭天，“禅”义祭地，两字又可以合为双音节新词“封禅”，单表祭天的意义。又如“修”、“先”，单字表词时，意义毫不相干，二字联合组成“修先”一词，表示“祭祖先”的意思，遂成为新的词。一个汉字与其它不同字符搭配可以组成系列新词，如“戏迷”，换一个字就可组成“球迷”、“歌迷”、“舞迷”、“影迷”等新词。相同的两个字符，通过不同顺序变换可以组成两个完全不同概念、不同词类范畴的词。如“人生”，改变顺序则成“生人”，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词；而用“门”、“上”两个字，组成的“门上”与“上门”两词，则分属两个不同词类范畴。汉字也能通过这种变序，组成意义上互为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新词，如“势态”、“语言”，改变顺序可以分别构成“态势”、“言语”，两组词在意义上既有联系又不等同。

除了一些连绵词、音译词，汉语合成词的词义一般具有可以分解的特性，所以单字组词就如同部件组装，常用汉字的排列组合就可以产生新词。因此，在汉语中，词语的数量虽然无可计数，堪称浩瀚，但是它们却仅仅是由几千个常用、次常用汉字组成的。汉字虽然繁多，但常用字非常集中，掌握了这些常用汉字，也就能够比较容易掌握汉语的基

本词汇。因了汉字与词的一致性，四、五千常用汉字就完全能够与语言发展保持同步，适应新的需要及应用。只需使用已有汉字进行新的配伍调整，就可以产生新的词语，也就等于增加了新字。有的时候也可以启用旧字、旧词，赋予其新义，构成新词。如“镭”字，在古代表示一种瓶、壶的名称，久已不用，而今人借以表示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名称，而一些词如“文化”、“文明”、“形而上”、“形而下”等，都被启用来表现新概念。

其次，汉字的社會功能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文言系统。

汉字虽然是为记录、表现汉语而产生的符号系统，但既经产生，由于其独特的象形表意特点，在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下，它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没有走上言语化道路。汉字与汉语一直既互相适应又互相促动，一方面汉字紧随汉语的发展，一方面又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汉语。汉字对汉语的反作用远较拼音文字来得强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文言及文言经典的形成。

“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1]。所谓书面语言，在中国古代其实有两个系统，即文言文与白话文。汉字相对汉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主要就是在文言的层面，中国文化得以通过汉字在四邻国家传播亦主要是借助了文言经典。钱穆曾论及中国文字称，“在战国以前，可说是中国人‘创造文字’的时代。在战国以下，则是中国人‘运用文字’的时代了”[2]。的确，夏商周秦四代两千年间，正是重要的中国元典形成时期，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到《尚书》、《周易》、《春秋》等六经，再到《老子》、《论语》、《孟子》等先秦子书，文言文已然发展为独立的书面语系统。书面汉语使汉字和汉语融合为一体，以经典的形式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思想财富。由于汉字的象形表意以及字词一致等特点功能，文言文省略了口语中无法避免的有关时、性、数等多种限制，形成文词简洁、语义凝练的特色，极富表现力。文言因此成为体系精密、适宜表现和传达各种事物、思想的符号工具。

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哲学观念、道德伦理规范、思维方式等等，藉由这些文言经典得以巩固、传承，而对这些文言经典的解释通常又是经由对文字义理的训诂而实现的，并形成中国特殊的学问：经学。在汉代独尊儒术、开经艺之试之后，文字更被目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说文解字》所收字即是五经文字，虽然这是一部文字学的著作，但作者编撰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了解经，一般在解释字义后直接引经以为书证，汉字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由此可见一斑。十三经用过的单字有6500多个，而汉字使用的范围至此亦限于“王政”、“经艺”方面。汉字以义构形一般皆有理据性，其构形本身体现了人类对事物的观察，负载了诸多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汉字形体构件表意的多义性，亦使得汉字对文化有较强的适应性。

正因如此，历史上古老的汉字及文言经典，一经传播到周边四邻国家，便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思想意识形态，“从中国的世界观看来，由汉字所载乃为事物的深层意义，随汉字而完全渗进四邻民族精神中去的正是这种意义”[1]。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又可以利用汉字形体的随意可解性作为自己的阐述载体，形成自己民族独立的话语场。

第三，汉字具有高度的超时空性。

与拼音文字的记音特质相异，汉字以记形、表意为核心，虽然也有表音的成分，却远远没有前者来得重要。汉字的这个特征，近百年来曾引发很大的是非公案，语言学界褒贬不一，此且不论。仅就汉字流布、传播过程而言，这却是它能够跨越时空，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地区、国家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一方面，历史上语音的变异并不影响汉字形义的表现能力。汉字不能够像拼音文字那样，由读音刺激人们对事物的联想；然而，因其自身的以义构形、以形表义特性，汉字形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随着语音的演变而演变。字形、字义演变较之语音，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持久性，尽管读音可能读不出，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是明确清晰的，不会因为读音的变化而模糊，汉字字形同语义之间的联系非常稳固。汉字因此能够自成系统，具有一种逻辑运演功能，对其形义的理解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长远而广泛的价值。音变形义不变，今音与古音的不同并不影响对汉字意义的理解，像《诗经》、《尚书》、《周易》、《春秋》、《老子》、《论语》等两三千年以前的先秦典籍，现代人仍然能够比较明确地通晓其义。

另一方面，各地域方言语音的差异亦不影响汉字形义的表现力。我国自古以来疆域辽阔，方言众多，语音演变的不平衡，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口语交际非常困难；但这种方音的障碍不但不影响对汉字形义的理解，反而可以通过汉字形成的书面语言得到解决，以形构义的汉字可以使人们超越语音的差异，而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汉字这种超越方言的功能对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影响，“首要是使中国人得凭藉文字而使全国各地的语言不致分离益远，而永远形成一种亲密的相似”，“如此则文字控制着语言，因文字统一而使语言也常接近于统一。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2]。

正是因为读音即使忽略不计，仍然可以以形索义，历史上的汉字成为汉文化圈国家的通行文字才具备了最基本的条

件。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